

使命型政党与人民群众:在自觉与自发之间

——对马克思主义一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赵玉洁 李海青

【摘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先进性,能够深刻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认知自身的历史使命,在理论上处于自觉状态,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与使命型政党的这种理论自觉相反,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在认知上往往处于自发状态,限于表象、注重眼前,对社会发展趋势与自身历史作用难以有效理解。政党自觉与民众自发对立统一:政党自觉需要对民众自发予以引导、提升,但两者同时也具有张力,一旦理论自觉出现失误就会导致自觉背离自发,损害民众利益。要有效解决自发与自觉的张力,一方面需要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另一方面要不断健全民主的制度机制。

【关键词】 使命型政党;自觉;自发;群众路线;民主

在马克思主义宏大而融贯的理论体系中,政党观与群众观都居于非常重要的理论地位。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最终以改变世界为价值旨归,而要实现社会形态的破旧立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人民群众是主体,两者都不可或缺。应该看到,就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局限于政治学的经验层面与行为层面去理解,而是从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高度去把握,自身有前提性的理论设定。这些理论设定深刻地影响了共产党对自身的认识及其实践行为,也深刻地塑造了并仍在塑造着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实际关系模式。深入分析这些前提性的理论设定,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政党理论,更好地理解党群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进一步推进党群关系的调适优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资本主义由于内在矛盾必然会走向灭亡,而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担负这种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除了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具有先进性、受的剥削压迫最重具有彻底的革命性、成员人数众多具有广泛性之外,一个关键原因就在

赵玉洁,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29);李海青,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于能够联合起来具有组织性。无产阶级的广泛联合、有效组织对于其完成使命极为重要,特别是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共产党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但是其与一般的无产阶级民众或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同,“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换言之,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通晓历史的发展规律、把握运动的发展进程、明确历史的发展方向,比一般的工人群众站的更高、看的更远,并且在实践中走在前列,最为坚决。按照对历史规律的认知,消灭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剥削与压迫,建立共产主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赋予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此而言,共产党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今天我们强调牢记使命,除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外,最终的一个内涵就应该是实现共产主义,并且牢记使命的提法也凸显了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特质。当然,在我们的党章中没有使用这一概念,我们党章中使用的是先锋队的提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②其实,究其实质,先锋队和使命型政党不过是同一个内涵的不同表达,正是因为思想、实践与德性等各个方面都堪为先锋,始终处于最前列,共产党才能发挥引领、带动、组织作用,承担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那么,共产党作为具有先锋队性质的使命型政党,又如何在理论上认知规律,实践中集中力量呢?是通过政党领袖的领导。“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③正是具有深厚理论素养与坚定理想信念的政党领袖在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明确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通过建立政党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并对政党成员与广大民众进行科学真理与运动策略的宣传教育。就此而言,政党领袖是建党的关键,对于整个政党的运转与存续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可以说是先锋队中的先锋,先进部队中的先进部队。

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对于共产党建立与无产阶级运动的这种关键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的非常清楚。“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④由于原初的无产阶级本身受长时间的辛苦劳动所累,身处社会最底层,自身文化知识匮乏,精神甚至处于麻木与野蛮状态,因而谈不到什么认知发展规律与自身使命的问题。其即使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整体而言也不过是处于自发层面,或者是为了更高的工资待遇、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或者沉醉于乌托邦的幻想,即使有所组织,或者形态非常松散,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或者成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②《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1页。

③《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24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1页。

为密谋式的秘密团体。就此而言,那种对历史运动趋势的深刻认知需要由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来完成,而这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群体只能来自有闲有知的资本家阶级,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即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这类思想家。正是这类思想家把工人运动从自发提升到自觉,如果没有这类思想家,工人运动至少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很难突破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与意识形态的桎梏,而会长期停留在自发水平。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式的问题: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应该担负使命的无产阶级却往往难以认识到自身的重担所在,认知混沌、观念困于现象世界而无法深入,这种伟大的使命却需要其他阶级的先知式的智识人物来发现、来揭示、来布道、来宣教,使命型政党的思想家却不是来自作为政党之社会基础的无产阶级。这种情况下,政党领袖的理论自觉与无产阶级的生活自发如何有效对接,能否切实有效对接、能否持续有效对接,就并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这是因为,使命型政党虽然以无产阶级为社会基础,但两者毕竟不是同一事物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异质性,理论要全方位的、如实的透视、统摄现实也具有极大的难度。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与民众的自发这种对比关系,列宁也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工人运动的自发因素虽然包含着自觉性的萌芽,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工人本来也不可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①因此,对工人运动来说,不能屈从和崇拜实践中的自发性,自觉性不能被自发性压倒。在此,列宁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尚未直接挑明的问题以十分明确的乃至有些极端的语言进行了表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完全不依赖于自发的工人运动的,甚至是和这种运动没有任何关系的,它仅仅只是先进知识分子头脑的产物。工人的自发甚至会倒向自己的敌人,社会民主党要费极大的力气把工人争取过来,然后把自己所认为的规律与工人的天命灌输给他们。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主要是强调自觉引导自发,两者的张力还不是十分显现,在列宁这里,自觉与自发的张力已经显而易见,自觉如果不能有效引导自发,自发甚至可能成为自觉的对立因素。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也好,还是列宁的论述也好,所谈到的这种政党自觉特别是政党领袖高度自觉而普罗大众自发的对比非常有意思:尽管按照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将最终推翻资本主义,但人民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却因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各种限制对于自身的地位与使命缺乏足够的认知,作为主体而不自觉,是政党领袖俯仰乾坤、洞察历史、把握规律、确定使命、指明方向、在工人运动中充当着灵魂与中枢,把握住了自发性中自觉因素的萌芽,顺势借势并通过自身宣传与组织工作最终将自发提升为自觉。就此而言,科学社会主义真正的灵魂与主体是使命型政党尤其是政党领袖,而被宣称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则时不时显现出其被动性与消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真正奥秘就在《共产党宣言》与《怎么办》的上述引文中。应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这种政党自觉与广大民众自发的差别并非

^①《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76—77页。

无足轻重,而是一个需要深入分析的重大问题,并且这一对比与差别始终贯穿在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产生以来领导民众的整个理论与实践活动之中。之所以需要深入分析,是因为政党特别是政党领袖如何保证其认识的规律恰恰就是工人运动所必须实际遵循的,其制定的策略是真正代表和反映民众根本、长远或现实利益的。政党的思想家当然会对工人实践有所了解,但其得出自己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靠理论的研究与规律的推演,主观如何保证能够完全符合客观并非是一个多虑的无意义问题。谁又能保证政党领袖所以为的自觉其实并非真正的自觉呢?应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上各方面的问题与失误是并不少见的。

二

政党自觉而民众自发的张力问题由于其在理论上的敏感性与实践上的极端重要性,实际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少政党领袖的注意与思考。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毛泽东的反思尤为典型、非常深入。在其经典著作《实践论》中,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他强调:“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①强调实践的第一性,实际就为解决自觉与自发问题提供了一个最扎实的基点:因为自觉属于意识领域,带有很大主观性,主观所认定的自觉是否能真正与民众的自发相对接,顺势应时而又有所提升,是否具有真理性,不能靠自我宣示,而最终要靠实践检验。毛泽东特别批判了两种错误的主观认识:一是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是思想超过实际的“左”翼空谈主义。前者以旧阶段的认识为真理,后者以幻想为真理或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两者都以为把握了自觉,实际却陷于谬误。那么,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持何种观点呢?“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②这种实践认识论的哲学观体现于现实中的党群关系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党的群众路线。按照毛泽东的理论逻辑,只有秉持实践认识论以及以之为理论基础的群众路线,才能够更好实现政党自觉与群众自发的统一: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努力挖掘自发中的自觉因素,使自觉源于自发而又高于自发,有效解决自觉与自发的张力,切实实现两者的对立统一。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先锋政党与人民主体的关系、对于使命型政党的自觉与普罗大众的自发的关系如何协调做出了自己的理论总结与实践探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对这个问题高度关注并倾注如此巨大精力去思考解决,正是因为革命战争年代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十分严重,几乎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而这些主观主义都是以理论自觉的形式出现与自我标榜的,并且这些主观主义者确实也认为自己切实地把握到了真理与规律,真正代表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与民众的自发愿望。正是基于这种惨痛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才如此强调实践,强调群众路线,强调既不能害慢性病,犯“尾巴主义”错误,也不能害急性病,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8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

犯命令主义错误。“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①正是以实践认识论为指导,将群众路线作为重要法宝,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才通过自身正确而自觉的领导,依靠人民而又为了人民,把握规律、沐风栉雨、砥砺前行,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然而,必须看到,政党和民众毕竟不能完全合而为一,自觉与自发毕竟是两种不同状态,实践认识论的有效贯彻和群众路线的有效践行都是有严苛条件的:政党领袖与党员干部必须能够真正解放思想,切实确立实践思维,不受本本束缚与教条所累,不存任何既定的成见,不把任何既定的观点当作想当然的结论而予以接受,即使对于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也是如此;政党领袖包括各级党员干部应该具有高度为民的情怀与德性,愿意深入实际去调查研究,而不能心存偏私、所有懈怠;政党领袖包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有足够的精力与时间去持续深入群众、把握民情、了解民意;政党领袖包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有足够的能力素质和良好的民主集中机制对于掌握的经验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感性到理性,把自发中的先进萌芽与进步趋势切实转化升级为自觉。而这些严格的条件并非是政党领袖与党员干部时时与人人都能够具备的。就此而言,即使明确了群众路线作为自发提升到自觉的法宝,这种提升仍然不是总能够成功实现的。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所经历的曲折探索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今天看的很清楚,当时“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所谓把握规律与理论自觉其实并非真正的自觉,而是自以为的自觉,是貌似自觉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这种虚假自觉所认为的对民众自发利益的代表实际上恰恰是对自发的背离,这种以自觉之名实施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民众真实利益的侵害。以这种虚假而错误的自觉去认知使命并付诸实践,政党使命的实现毫无疑问也必然会出现问题。

明确阐述实践认识论并一贯强调群众路线的党的领袖为什么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最为关键。一方面就是以上论及的调查研究成功进行的条件要求往往难以满足。郑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要素》一文中对此做过深刻分析。即使在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毛泽东也多次强调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也一再强调高级领导干部一年要有几个月时间走出机关,“一竿子插到底”,从而了解真实的情况。但是,这种调查研究并没有使毛泽东真正了解情况,反而使得他得出了许多非常理想化的想法,进一步坚定了其激进赶超的信念。“可见,并不是说只要提倡和进行调查研究就能了解国情,就能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准确把握国情,这是就一般原则、方法来说的。但就某个历史阶段、某个个体来说,调查研究也未必能了解国情。之所以出现这样‘调查失灵’的情况,除了受到事物发展程度和问题暴露程度、经验积累的多寡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外,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从一些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公式出发,更看重那些符合自己观点的事实或意见,希望调查印证已有的认识;不能接受他人调查所获得的不同于自己的结论,等等。”^②毛泽东当年之所以批判包产到户的民众自发倾向,就是因为他始终固守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机制过于依赖政党领袖与党员干部个人的主体素质,既然如此,当政党领袖与党员干部自身主体素质出现问题,或既定的思维定式难以打破,或思想懈怠无意于此,结果就显而易见。由此,在自觉与自发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产生断裂也就在所难免。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5页。

^②郑谦:《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0页。

另一方面,自觉与自发的背离还有制度的因素。高度集中、对上负责的制度体制下,党的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制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经常受到破坏,纵向的信息传递往往会以上级的喜好为取舍,党和国家的领导绩效更大程度上指靠领袖个人的开明与否。1962年刘少奇曾对此做过尖锐批评:“看领导上的意图讲话,你要求什么喜欢什么,他就把那方面的情况反映给你,这种情况恐怕相当普遍,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一种不良的风气。”^①“高度集中制大大限制了由下向上反映情况的能力和监督能力,降低了群众的参与热情,使之虽然长于迅速决策并有力贯彻,但却缺乏及时有效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纠错机制。”^②在这种信息传递失真、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体制下,最高决策者难以听到“对台戏”,只会逐渐强化其已有观念,往往沉浸在自觉认识规律、把握历史大势的主观想象与设计之中,而与社会现实严重脱离。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会因自认为把握规律、代表真理、真心为民而利用自身权威加以压制,从而导致“一言堂”“独角戏”。邓小平1980年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对此有非常系统深入的分析。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匮乏最终导致主观自觉与客观自发的背离。

调查失灵与制度失效都使得理想意义上的政党自觉与民众自发的关系难以实现,有的情况下所谓对规律的自觉已经严重脱离了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与自发意愿,自觉本身异化为一种异己的强制性力量作用于民众,所谓对规律的把握往往只是停留在主观认为的层面。由历史观之,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揭示、列宁挑明的政党自觉与民众自发的对立与差别,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进程中,虽然后继的政党领袖努力予以协调、整合,以图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但整体来看,成绩固然明显,但问题亦未根本消解,可谓经验与教训并存。

三

那么,这一存在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语境下又究竟如何看待与解决呢?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其特定的理论范式,政党自觉与民众自发的设定就涵括其中。如果转换到现代民主政治的语境中,对于这一问题可能会有新的不同的思考视角。依据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现代国家存在的法理依据是人民主权,而人民这样一种主权是通过公民享有的各项法定权利得以体现的。人民是一个整体概念,整体的人民必须具体化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这样人民主权才能够落实落细,才具有实操性。

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作为先锋队的使命型政党而言更多是被唤起、被组织、被引导的追随者角色,相对被动而停留于自发,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视野中,公民则是具有权利、能够选举执政者、能够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相对主动的政治角色,而并不总是有待政党领袖与党员干部深入其中,了解其意愿的被带领者和被调查者;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政党领袖之所以能够达到自觉是因为把握了规律,形成了对问题的客观性认识,而并不依赖于对民众自发趋势的考虑,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视野中则不然,现代国家的政党与领袖首先要考虑的是公民自身的意见与诉求;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政党领袖通常被设定为德性与真理的化身,认知最深刻、信仰最坚定,由于卓越伟大而可以“免检”,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视野中,政党领袖则逐渐被祛魅,被还原为一个尽管可能十分优秀但不至于伟大至“免检”,也需要被有效监督制约的政治个体;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使命型政党尽管也关注民众现实利益,但更注重民众的根本与长远利益,致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5页。

^②郑谦:《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第412页。

力于实现宏大的历史使命,孜孜以求未来的美好理想,并根据这种未来的价值追求赋予现在的实践努力以意义,现代民主政治则更为强调公民的现实生活世界与具体利益诉求,即使有发展的规划设计,也不指向遥远的未来,现实的生活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不用未来的价值目标来赋予;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政党自觉与民众自发的理论设定尽管有其普遍意义,但更适用于特定语境尤其是革命形势高涨、跌宕起伏的历史巨变时刻,因为这样的历史形势会更为凸显伟大人物的作用,现代民主政治作为较为稳定化的常态政治则更为注重自发民意的作用,一个个普通的公民个体及其组织逐渐成为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政治领袖的作用相对历史突变时刻有所弱化。

以上分析说明,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视野中,政党自觉与民众自发的关系需要重新进行思考与定位,因为作为出发点的理论范式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尽管仍然需要对自发的民意进行吸纳、整合、概括、提升,但其只有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才能成为执政党,公民通过各种民主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其制定的政策与法律决不能脱离广泛的民意基础。换言之,尽管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仍然要把握规律,努力使理论认识达到自觉层面以实现领导,但是民众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并且要求通过公民身份与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现代民主日益发达,民众的自发利益诉求与法定民主权利相对而言政党必须予以更大权重的衡量,更为认真的对待。“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①由于公民具有各种政治权利,能够自下而上地对执政党的党员干部进行有效的规范制约,使得领导干部不敢懈怠也不能懈怠,使其对民意不敢忽视也不能忽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自上而下的调查过于依赖领导干部个人德性与品质的问题。由于公民的意见表达涉及方方面面,来自基层、源于生活、源自体验,一般而言更为具体而真实,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自上而下调查研究中政党领袖与领导干部由于精力与时间所限对信息获取不足不真的问题。由于民意的及时表达,政党政策实施的效果可以得到尽可能迅速的反馈,这种灵活有效的民主反馈机制很有针对性的解决了权力高度集中体制下反馈迟缓的问题。在那种体制下,只有酿成惨痛的教训、面临深刻危机,政策的重大调整才成为可能。再一个,现代社会中,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与理性分析能力整体而言已经大大提升,自主性不断增强,早已不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时期那种原初的认识水平,部分民众的有些意见表达已经不是停留于单纯的自发层面,而是具有了较为深入的识见,趋于对问题的合理认知。这种情况下,再单纯依靠使命型政党传统的自觉与自发的理论框架来认识问题已经不再完全合乎时宜。

当然,以上分析并不是否认群众路线在将群众自发意见整合提升为政党自觉认识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并不是否认其在今天依然具有的重大意义。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与优良传统,群众路线在今天毫无疑问仍然需要坚持,并且需要根据新的社会形势与时代条件予以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强调指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民团体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②以上分析也不是否认使命型政党仍然需要做艰苦的将自发升华为自觉的努力,这是因为,无

^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11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第8—9页。

论公民的意见表达如何充分、如何理性,要将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与意见要求有效整合,使其条理化、清晰化、规范化仍然离不开政党的决定性作用。以上分析只是意在说明,尽管民众自发与政党自觉作为矛盾双方,从哲学意义上讲,彼此之间的张力难以彻底化解,双方无法真正完全的实现同一,但是在现代化的视域中,一方面通过传统群众路线的坚持与发展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民主政治的不断健全完善与公民自主化的利益表达,两者的张力应该能够做到尽可能最小化:以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为指导,以牢固的民意把握为基础,使政党认识到的自觉切实源于现实生活、建基于自发、整合自发、凝练自发、提升自发,但又不脱离自发、代替自发,而是代表了自发的客观要求与持久趋向,达到认识的理性化乃至对相关规律认识的深化。就此而言,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十分重要。

(责任编辑:蒋永华)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ssion-oriented Political Party'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People's Theoretical Spontaneity:

An Important Issue of Marxism

ZHAO Yujie, LI Haiqi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Marxism, as a political party of the proletari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an advance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at can deeply grasp the law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recognize its own historic mission, and is theoretically conscious. This is the major reason why it can be called a mission-oriented political party. Contrary to the fact that the mission-oriented political party is equipped with a strong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the general public, including the proletariat, are often in a spontaneous state of cognition; they usually just focu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and are limited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tters, so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effectively understand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s and their own historical ro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people's theoretical spontaneity is in a unity of the opposites; the party's consciousness is necessarily used to guide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s spontaneity and there is a tension between them at the same time. Once the party commits mistakes in developing it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it will deviate from the people's position and hurt their interests.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people's spontaneity and the party's consciousnes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PC to adhere to and develop its mass line on the one hand an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democratic system on the other.

Key words: mission-oriented political party; consciousness; spontaneity; mass line; democracy

About the authors: ZHAO Yujie, PhD in Philosophy,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LI Haiqing, PhD in Philosophy,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